

双边关系如何影响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孙俊成¹, 叶陈刚^{2,3}, 贾瑞哲⁴

(1.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 经济学教研室 浙江 嘉兴 314001;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3. 西京学院 会计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3;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 积极扩大进口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我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更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双边关系作为扩大进口贸易、提升进口质量的前提与基石,能通过提高企业利润、加剧市场竞争程度和降低国家进口贸易管制强度等机制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实际影响。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高度精细化数据构建国家关系-企业-产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双边关系改善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正向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同时双边关系的影响作用也会随着企业性质、贸易方式、行业及进口来源国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因此,进口产品质量升级可以通过双边关系的稳定与提升、与发达经济体及 APEC 成员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大力推动加工贸易向中高端价值链攀升等具体实践得到优化。

关键词: 双边关系; 进口贸易; 进口产品质量; 中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23)06-0012-10

一、引言

进口贸易在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扩大进口也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而如何提升进口质量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1]。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进口,不仅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且能通过促进先进设备和中间品的进口来优化国内制造业的生产水平,更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进程中,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边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一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均是扩大进口贸易、提升进口质量的前提与基石,也是进口贸易由快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事实上,中国进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双边关系。当前,中国已与 182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外交关系,也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其他经济体加强政治沟通、实现贸易畅通。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中国进口贸易额在 2000—2013 年间由 1.86 万亿元提升至 12.1 万亿元,2022 年达到 18.1 万亿元,平均增长率达到 11.79%,尤其在“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全球进口贸易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30%。面对进口产品从“量”的提高到“质”的飞跃这一境况,

收稿日期: 2023-07-27; 修回日期: 2023-10-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后疫情时代上海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方向与发展策略研究”(2021ZJB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推进制度型开放下我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的重点与路径研究”(23CJY076); 重庆社会科学规划一般委托项目“数字化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践研究”(2021WT4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构建战略研究”(23BGJ032)

作者简介: 孙俊成(1982—),男,河南固始人,经济学博士,浙江红船干部学院经济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区域经济; 叶陈刚(1962—),男,湖北蕲春人,管理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京学院会计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公司治理; 贾瑞哲(1991—),女,河南封丘人,通讯作者,经济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大国关系。

我国正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实现助力。例如,《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提到,要进一步扩大进口、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台阶;商务部《“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更是强调进口的重要作用。可见,探寻进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机制与路径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研究课题。

那么,中国在入世之后的进口产品质量如何?双边关系的改善是否真正提升了进口质量?能够进一步推动进口质量升级吗?中国能否通过构建良好的对外交往关系来推动进口产品质量改善,进而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呢?这些都是本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双边关系确实能够影响对外贸易。联合国相似投票、高层互访、两国建交等双边关系的改善可以扩大国家间贸易,而武装冲突、战争等双边关系的恶化则会对双边贸易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优化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问题。通过改善本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措施都能助力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有学者关注双边关系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其中的理论机制也有待研究。实际上,双边关系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话题,正成为一国在经贸领域寻求本国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工具。当双边关系不断改善时,双边贸易之间的不确定性日益减弱,国家间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贸易伙伴也会日益注重在中国市场中的质量声誉,从而间接提升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然而,双边关系的改善究竟能否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产生正向的提升作用?如何产生影响?效果多大?均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检验。鉴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匹配海关数据和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双边关系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从企业微观层面为我国增加优质进口、提高进口质量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思考。

二、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之间在外交上和经贸上的双重互动愈发频繁密切,学者们开始探究双边关系的经济效应。原属于政治学领域的双边关系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学相关问题。但总体上,从进口产品质量视角研究双边关系经济效应的文献较少,国内外学者大多都是分别独立探讨双边关系的经济效应或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首先,双边关系具有经济效应,能够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Pollins^[2]率先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刻画了双边关系的国际贸易影响;Martin *et al.*^[3]在扩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验证,均得出双边关系能够影响国家间进出口贸易的结论。经验研究方面,Keohane^[4]认为双边关系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来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Rose^[5]进一步用出口国在进口国的领事馆数目作为外交关系的衡量指标,并发现该指标能够影响出口国的出口额;而Glick and Taylor^[6]则验证了战争对贸易有持续显著的负面影响。一些学者研究不同国家对外关系的贸易效应:Nitsch^[7]验证了美、德、法三国元首国事访问次数与出口贸易额成正比,Berger *et al.*^[8]指出美国中情局的干预能够同时对本国的进口和出口贸易产生不同影响,杜映昕等^[9]从行业进口角度分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贸易效应。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检验了双边关系对贸易二元边际^[10]、出口产品质量^[1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12]等的影响。然而,双边关系与进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对于其现实影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其次,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较多,双边关系能够通过调节相关因素的变动从而影响进口产品质量。魏浩和李晓庆^[13]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仅对中等技术产品的进口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对高、低技术产品进口质量的影响都不显著。施炳展和张雅睿^[14]则利用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库,实证分析后得出贸易自由化能够促进我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提高的结论。余淼杰和李乐融^[15]进一步揭示了贸易自由化对不同企业中间品进口质量的影响,即对一般贸易企业影响较大,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作用不明显。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内收入水平^[16]、政府补贴^[17]、贸易便利化^[18]、营商环境^[19]等都会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可见,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受多重因素影响,但双边关系如何进一步导致这些因素的变化,相关理论机制仍有待提出和实证分析也亟需深入研究。

有关双边关系经济效应和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已比较充实,现有文献已经证实了双边关系能够对进口贸易产生作用,但尚未更进一步地关注进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问题,同时其中的影响机制和现实效应研究也相对匮乏。基于此,本文将从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探索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边际贡献在于:(1)结合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交叉领域的研究视角,从双边关系的进口效应研究出发,进一步提出国际关系对进口贸易、进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的假说,探讨其中的机制路径,从而拓展现有理论和思路。(2)以往大多数研究中对双边关系的刻画较为模糊,多采用战争冲突、高层互访等活动作为构建双边关系指标的基础,未能全面描述两国双边关系的现实情况。本文则选用前沿研究中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测算各国政治立场理想点,计算两国双边关系的距离,更为接近描述双边关系的全貌。(3)将利用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在拓展理论研究的同时,为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升进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

三、理论机制

本文主要讨论双边关系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机制。

首先,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框架下,双边关系被看作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高层次制度安排,在政策法规制定和完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20]。双边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并避免因寻找新的贸易市场而产生更大的贸易成本^[21]。因此,双边关系改善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经营利润^[22]。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利润增加,可覆盖企业进口高质量中间品的固定成本,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14-15];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利润增加会加剧市场竞争程度^[18]。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又会进一步促使企业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具体而言,市场竞争可以通过消除X-无效率提高企业生产率,或通过激励企业进行研发从而提升企业生产率^[23]。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又会增加对高质量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最终提升进口产品质量。综上,双边关系改善会降低贸易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最终促使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路径为:双边关系改善→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其次,双边关系改善会推动国家间有效开展经贸往来,以及提高合作意向,且在双边关系达到一定亲密程度时,为实现经贸合作,国家间会签订协定推动经济相互依赖^[24-25]。此时,双边国家会逐步放松贸易管制,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构建自由化的贸易关系,即贸易自由化^[26]。而进口高质量中间品作为一国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途径,贸易自由化会降低进口高质量中间产品的贸易成本和相对价格,促进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27]。因此,双边关系改善会通过降低国家进口贸易管制强度,推动实现贸易自由化,进而提升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即双边关系改善→降低国家进口贸易管制强度→推动贸易自由化→推动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双边关系的改善会推动企业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假说2:双边关系的改善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推动企业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假说3:双边关系的改善会通过降低国家进口贸易管制强度推动企业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四、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双边关系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ln quality_{inkt} = \beta_0 + \beta_1 \ln policy_{nt} + \varphi \ln X + \mu_{i_n} + \mu_t + \varepsilon_{inkt} \quad (1)$$

其中*i*代表企业,*n*代表进口来源国,*t*代表年度,*k*代表制造业行业, $\ln quality_{inkt}$ 代表企业进口产品质量, $\ln policy_{nt}$ 代表双边关系,*X*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含贸易便利化 $\ln tf_{nt}$ 、资本强度 $\ln klratio_{inkt}$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ln tfp_{inkt}$ 、企业存续年限 $\ln age_{inkt}$ 、企业规模 $\ln size_{inkt}$) μ_{i_n} 为企业-来源国固定效应, μ_t 是时间固定效应, ε_{inkt} 是随机扰动项。公式(1)用来检验双边关系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总体影响,其中估计系数 β_1 刻画的是双边关系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总体影响,若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双边关系对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反之则是抑制作用。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 Hallak and Sivadasan^[28] 的研究为基础,参考 Fan *et al.*^[27] 及孙俊成和程凯^[11] 的做法,在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的框架下,测算进口产品质量。假定价格相同的两种产品,产品市场需求越大,则说明产品质量越高。由此可得产品的需求函数:

$$q_{inkt} = p_{inkt}^{-\sigma} \lambda_{inkt}^{\sigma-1} \frac{E_t}{p_t} \quad (2)$$

其中 E_t 为中国消费者 t 年的总支出, p_t 是效用函数对应的价格指数。对式(2)两边取对数、线性化处理及整理后,得到最终计量模型:

$$\ln q_{inkt} = \mu_t - \sigma \ln p_{inkt} + \varepsilon_{inkt} \quad (3)$$

其中 $\mu_t = \ln E_t - \ln p_t$ 是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中国消费者在该产品上的消费情况;残差项 $\varepsilon_{inkt} = (\sigma - 1) \ln \lambda_{inkt}$,包含企业 i 在 t 年从 n 国进口的产品质量。通过估计式(3),可得回归残差 ε_{inkt} ,即产品质量 $(\sigma - 1) \ln \lambda_{inkt}$ 的测算值。取 $\sigma = 5$,最终进口产品质量如下所示:

$$im - quality_{inkt} = \ln \lambda_{inkt} = \frac{\varepsilon_{inkt}}{\sigma - 1} \quad (4)$$

2. 核心解释变量

双边关系 ($\ln policy_{nt}$) 表示中国与伙伴国 n 在 t 年的双边关系距离。该指标运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测算各国政治立场理想点,将各国理想点分分之差的绝对值作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距离。其中,数值越小,代表中国与 n 国的双边关系越近,反之则越疏远。

近年来,双边关系被纳入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的研究中,因而其度量就显得越发重要。目前已形成分别以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和政治事件数据为基础的两类方法。国外的世界事件互动测量、冲突与和平数据库、国家事件比较研究等事件数据库建立已久,国内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的构建与使用也趋于成熟。鉴于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对外交关系持续性影响的衡量,因此运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来测算各国在不同年份政治立场的理想点^[29]。鉴于该理想点是以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点具体分值的形式存在,因此本文对各国理想点分值先求差再取绝对值,作为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距离。

3.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有贸易便利化、资本强度、成立时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规模。贸易便利化水平参照程凯和杨逢珉^[18] 的方法,根据《中国口岸年鉴》《中国信息化发展指数监测年度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应数据计算得出。企业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则借鉴了 Head and Ries^[30]、许和连和王海成^[31] 的近似测算方法^①,企业成立时间采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来表示,企业相对规模以全部职工人数作为该变量的替代指标,资本强度用固定资产净值的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数之比表示(以 2000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进行平减,作为固定资产净值的年平均余额)。为进一步控制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本文还增加了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如人口密度、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程度、财政干预程度。表 1 为变量的定义。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主要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联合国大会(UNGA)投票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 2000—2013 年。具体处理过程如下:第一,参考 Brandt *et al.*^[32] 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进行了重新识别,在此基础上剔除其中不符合经济理论常识的样本;第二,参考施炳展和邵文波^[33] 的做法,对海关数据库进行清洗;第三,利用 Bailey *et al.*^[34] 的

^①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程为: $\ln \hat{p} = \ln(y/l) - s \ln(k/l)$,其中 y 为工业增加值, l 为年从业人数, k 为固定资产规模, s 为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贡献度(令 $s = 1/3$)。囿于数据的获得性,将企业工业总产值作为近似替代值。

计算方法,以联合国大会(UNGA)投票数据为基础来测算各国政治立场的理想点,以各国理想点分值之差的绝对值作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距离;第四,参考余森杰^[35]的方法,将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随后将测算出来的双边关系指标,按照进口来源国和年度匹配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中,从而得到本研究所需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五、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为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发生,我们将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其中,列(1)是模型仅引入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至列(6)是依次将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渐引入,双边关系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与伙伴国双边关系距离数值越小,越有利于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即双边关系改善总体上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这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研究假说1的合理性。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lnpolicy_{nt}$	-0.017*** (-18.15)	-0.017*** (-18.30)	-0.017*** (-18.06)	-0.017*** (-17.82)	-0.017*** (-17.71)	-0.017*** (-17.75)
lnf_{nt}		-0.095*** (-11.78)	-0.096*** (-11.93)	-0.102*** (-12.59)	-0.104*** (-12.81)	-0.105*** (-12.97)
$lnfp_{inkt}$			0.008*** (8.70)	0.008*** (8.35)	0.009*** (9.71)	0.009*** (8.97)
$lnage_{inkt}$				0.011*** (4.95)	0.009*** (3.98)	0.008*** (3.79)
$lnsize_{inkt}$					0.006*** (5.01)	0.010*** (7.57)
$lnklratio_{inkt}$						0.006*** (6.29)
常数项	-1.131*** (-27.57)	-1.234*** (-29.48)	-1.242*** (-29.68)	-1.277*** (-30.21)	-1.318*** (-30.65)	-1.371*** (-31.35)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来源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221	0.221	0.221	0.221	0.221	0.221
观测值	3 909 117	3 909 117	3 909 117	3 894 929	3 894 929	3 894 116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此外,针对各控制变量而言,贸易便利化、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存续年限、企业规模及资本强度等

提升均能显著提高企业进口产品质量。(1) 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有助于节约企业交易成本,间接增加企业利润,推动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此时就需要更高质量的中间品与之匹配,从而推动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3) 企业存续年限。随着企业存续年限的不断延长,其在进口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经验,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越有能力识别和进口高质量产品,从而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4)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就越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便于增加研发投入与实现技术升级,进而提高对进口产品质量的需求,推动进口产品质量升级。(5) 资本强度。资本强度越高,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数之比越高,越有能力积极开展各类技术研发活动,提高自身生产技术水平,进而推动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二) 扩展性分析

考虑到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会因为企业性质、贸易方式、行业及进口来源国的差异而不同,因此本文选取不同企业、贸易方式、行业及进口来源国的子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

1. 企业异质性分析

企业异质性主要考虑其性质及开展贸易的方式。一是按照企业性质,将总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组,其中外资企业包含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二是依据贸易方式,将总样本划分为一般贸易型企业和加工贸易型企业两组。

表3为不同企业性质与两类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由列(1)至(3)的结果可知,双边关系改善对三类不同性质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都存在显著的促进影响,但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外资企业受到的影响强度最大,其次是国有企业,最后是私营企业。究其原因,外资企业在语言和信息沟通方面要比内资企业占有绝对的优势、国际贸易时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同时,外资企业凭借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面临双边关系改善所引致的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时,能更快地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升级,并依靠优势迅速匹配高质量产品需求,最终达到产品质量的升级。因此,当双边关系改善时,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更容易实现生产结构升级,从而对进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更大。从国内企业来看,国有企业政策支持、规模体量、产品生产规模、产品信息的获取能力和进口实力,都优于规模较小、资金和技术实力较弱的私营企业,因而国有企业会优先享受到政治关系改善所带来的福利效应,也会受到更强的进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根据列(4)和列(5)可知,相比于一般贸易型企业而言,双边关系改善对加工贸易型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明显较大。究其原因,加工贸易型企业主要是对来料和来件进行加工,完成后再销往国外市场,其生产经营完全是依靠进口中间品来实现;并且从事加工贸易生产的企业,其产品最终都将销往国外市场,面临较大的国外市场竞争压力。因此,当双边关系改善时,加工贸易型企业面临的海外市场竞争压力要比一般贸易型企业大,在竞争激励效应作用下,其对进口中间品质量的需求也更强,从而更有利于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

表3 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国有企业	(2) 私营企业	(3) 外资企业	(4) 一般贸易	(5) 加工贸易
$\ln policy_{it}$	-0.023*** (-5.03)	-0.020*** (-12.47)	-0.026*** (-11.41)	-0.013*** (-9.06)	-0.015*** (-8.81)
常数项	-1.033*** (-4.99)	-1.938*** (-13.85)	-1.877*** (-15.08)	-1.949*** (-14.58)	-1.810*** (-21.60)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来源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138	0.300	0.496	0.364	0.202
观测值	288 123	1 604 900	1 905 847	1 424 218	1 601 615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

2. 行业异质性分析

本文参考 Lu *et al.* [36] 的研究对行业进行划分。首先,依据资本劳动比把所有行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先选择各行业所有企业资本劳动比的中位数作为该行业的代表性水平,然后以 1/2 为分界点,将资本劳动比小于 1/2 的行业设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大于 1/2 的行业设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次,将所有行业按照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额比例细分为出口密集型行业和非出口密集型行业,将各个行业内所有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额之比的中位数作为该行业出口销售比,同样以 1/2 为分界点,行业出口销售占比小于 1/2 的行业设定为非出口密集型行业,大于 1/2 的行业则为出口密集型行业。基于此,本文对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4。

由表 5 中列(1)和列(2)可知,双边关系改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事实上,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多作为中间投入品被用于生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则更多走向最终消费。这就决定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水平和资本要素往往比资本密集型行业低,该类行业多数都是在进口海外中间品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等,因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更加依赖进口产品,属于

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也会紧抓因双边关系改善而引致的伙伴国出口放松管制、贸易成本下降等进口机遇,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来实现其全球价值链攀升。比较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双边关系改善对出口密集型行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非出口密集型行业,这也提醒政府应当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从而更好地抓住双边关系改善的契机来实现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3. 进口来源国异质性分析

发达国家具有人均收入水平高、市场机制更为健全等特点,这些均会影响他国企业进口进入市场。例如,健全的市场机制可以为企业海外经营活动保驾护航,因此企业选择发达国家为来源国更有利于其开展进口贸易。基于此,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标准,进口来源国可进一步分为发达经济体和非发达经济体。考虑到不同进口来源国的发展阶段、对外关系等差异均会对进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37],进口来源国还对 APEC 成员和非 APEC 成员进行识别。

通过考察上述两个层面来源国异质性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显示,双边关系的改善对于企业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

表 4 不同行业类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出口密集型	非出口密集型
$\ln policy_{it}$	-0.017*** (-16.96)	-0.024*** (-20.07)	-0.019*** (-16.19)	-0.015*** (-9.35)
常数项	-1.491*** (-31.88)	-1.392*** (-23.54)	-1.331*** (-20.09)	-1.798*** (-24.99)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来源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220	0.285	0.252	0.225
观测值	1 944 327	1 949 789	1 946 627	1 947 489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表 5 不同进口来源国下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发达经济体	非发达经济体	APEC 国家	非 APEC 国家
$\ln policy_{it}$	-0.012*** (-11.10)	-0.011 (-0.52)	-0.017*** (-15.42)	0.009 (1.46)
常数项	-1.266*** (-25.78)	-1.721*** (-14.77)	-1.514*** (-28.76)	-1.441*** (-15.99)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来源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277	0.216	0.201	0.306
观测值	3 400 067	494 049	3 117 336	776 780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从非发达经济体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则作用不明显。究其原因,与发达经济体相比,非发达经济体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弱,企业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较高,这些会对企业研发资金存在较大的挤出作用,从而限制企业生产技术水平提升能力较大,最终导致非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动力不足。这也从进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角度印证了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与发达经济体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由列(3)和列(4)可知,双边关系改善对于从 APEC 国家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从非 APEC 国家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则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与非 APEC 成员国相比,中国已经和 APEC 国家有着较高等度的贸易往来,各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弱,对于 APEC 成员国的产品有着更强的识别度。因此,当双边关系进一步完善时,中国和 APEC 成员国之间的信息溢出能力更强,加之贸易成本的降低,中国企业能够优先识别及进口 APEC 成员国更高质量的产品,也更容易实现进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三) 机制检验

本文以降低企业贸易成本和国家进口贸易管制强度为中介变量进行了机制检验,检验结果均为通过^①。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进行了变量替换和回归方法替换检验、内生性检验、切换回归样本检验,检验结果均为通过^②。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检验了双边关系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 双边关系改善整体上对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且该效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降低进口管制程度两条途径实现的。(2) 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作用,会随着企业性质和贸易方式、企业所处行业异质性、进口来源国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具体地,双边关系改善对于外资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最强,其次是国有企业,最后是私营企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大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出口密集型行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大于非出口密集型行业;对于从发达经济体及 APEC 成员进口的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1) 中国政府继续积极推动友好型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规范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在促进文化交流、开展援助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公共外交行为。各相关部门也要多措并举地保障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协调关系,有效推进其与贸易伙伴关系的构建、提升和持续,更好地发挥微观企业的民心联通作用。(2) 积极推动与世界发达经济体及 APEC 成员国间的友好合作,通过缔结规则明确、条款清晰的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构建深度的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增强国家间贸易互信,从而深化双边经贸往来,推动进口产品质量升级。(3) 与外交关系良好的国家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中国政府要积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方式,加强进口中间品的国际议价权,推动国内进口技术标准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与合规兼容。同时,还要积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建立标准意识和现代化生产体系,承接更高增加值的加工业务,提升进口产品质量,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参考文献:

[1] 魏浩等. 2021 中国进口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2.

① 因篇幅所限,未汇报具体检验结果,备索。

② 因篇幅所限,未汇报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备索。

- [2] POLLINS B M. Conflict , cooperation and commerce: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nteractions on bilateral trade flows [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1989 , 33(2) : 465 – 480.
- [3] MARTIN P , MAYER T , THOENIG M. Make trade not war?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2010 , 75(3) : 865 – 900.
- [4] KEOHANE R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5.
- [5] ROSE A K. The foreign service and foreign trade: embassies as export promotion [J]. The world economy , 2007 , 30(1) : 22 – 38.
- [6] GLICK R , TAYLOR A M. Collateral damage: trade disruption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ar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 2010 , 92(1) : 102 – 127.
- [7] NITSCH V. State visi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World economy , 2007 , 30(12) : 1797 – 1816.
- [8] BERGER D , EASTERLY W , SATYANATH N S. Commercial imperialism?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de during the cold war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2013 , 103(1) : 863 – 896.
- [9] 杜映昕 郭美新 余心玓. 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行业贸易的影响: 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J]. 经济学报. 2017 4(1) : 13 – 40.
- [10] VISSER R.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the margins of trade [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 2019 , 46(C) : 41 – 54.
- [11] 孙俊成 程凯. 双边政治关系、产品质量与出口行为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7) : 90 – 104.
- [12] 张为付 吴怡.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区位选择——基于双边友好外交关系的视角 [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1(1) : 88 – 97.
- [13] 魏浩 李晓庆.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 [J]. 世界经济. 2019 42(6) : 143 – 168.
- [14] 施炳展 张雅睿.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9) : 3 – 21.
- [15] 余淼杰 李乐融. 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证据 [J]. 经济学: 季刊. 2016 , 15(3) : 1011 – 1028.
- [16] HALLAK J C.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2006 , 68(1) : 238 – 265.
- [17] 许家云 毛其淋. 生产性补贴与企业进口行为: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J]. 世界经济. 2019 42(7) : 46 – 70.
- [18] 程凯 杨逢珉.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 [J]. 经济评论. 2020(5) : 82 – 97.
- [19] 陈天一 赵贝贝 洪卓睿. 营商环境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J]. 宏观质量研究. 2023 , 11(3) : 64 – 81.
- [20] 孙楚仁 赵家敏 徐锦强.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为何会降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2(11) : 104 – 122.
- [21] MCDONALD B , EGER R J. The defense-growth relationship: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 into post-soviet states [J]. Peace economics ,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 2010 , 16(1) : 1 – 28.
- [22] LEJOUR A , CREUSEN H . Using stepping stones to enter distant export markets [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 2015 , 15(1) : 107 – 132.
- [23] HOLMES T J , SCHMITZ J A.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a review of evidence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 2010 2(1) : 619 – 642.
- [24] MANSFIELD T , KAPLAN S , FITZPATRICK G , et al. Toward locales supporting collaboration with Orbit [J]. Information & software technology , 1999 41(6) : 367 – 382.
- [25] 孙玉红. 跨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动机分析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7) : 72 – 78.
- [26] 郭炳南 程贵孙. 城市化水平、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4) : 18 – 26.
- [27] FAN H C , YAO A L , YEAPLE S R. Trade liberalization , quality , and export prices [J]. 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2015 97(5) : 1033 – 1051.
- [28] HALLAK J C , SIVADASAN J. Productivity , quality and exporting behavior under minimum quality requirements [R]. NBER working paper , No. 14928 2009.
- [29] BAILEY M A , STREZHNEV A ,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61(2) :430 – 456.
- [30] HEAD K , RIES J. Heterogeneity and the FDI versus export decision of Japanese manufacturers [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17(4) :448 – 467.
- [31] 许和连 ,王海成.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J]. 世界经济. 2016 ,39(7) :73 – 96.
- [32] BRANDT L , BIESEBROECK J V , ZHANG Y F.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39 – 351.
- [33] 施炳展 ,邵文波. 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 [J]. 管理世界. 2014(9) :90 – 106.
- [34] BAILEY M A , STREZHNEV A ,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61(2) :430 – 456.
- [35] 余淼杰.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的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 2011 ,10(4) :1251 – 1280.
- [36] LU J Y , LU Y , TAO Z G. Exporting behavior of foreign affiliat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1(2) :197 – 205.
- [37] 赵春明 ,文磊 ,李宏兵. 进口产品质量、来源国特征与性别工资差距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34(5) :20 – 37.
- (责任编辑:王顺善;英文校对:谈书墨)

How Does Bilateral Relations Affect Import Products'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SUN Juncheng¹ , YE Chengang^{2 3} , JIA Ruizhe⁴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Zhejiang Redboat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 Jiaxing 314001 , China;

2.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 Business School , Beijing 100029 , China;

3. School of Accounting , Xijing University , Xi'an 710123 , China;

4. School of Economics ,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24 , China)

Abstract: Actively expanding impo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and high-level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 and how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products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fact , as the premise and cornerstone of expanding Import and improving import quality , bilateral relations can have a real impact on the quality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imported products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improving enterprise profits , intensify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reducing the intensity of national Import control. On the basis of matching the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the customs trade database , this paper further uses highly refined data to build the Panel data of national relationship enterprise product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 and verifies the positiv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mprovement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imported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ll also depend on the nature of enterprises , trade patterns There are differences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industries and import source countries. Therefore ,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products can be optimized through specific practices such as stabilizing and improving bilateral relations , signing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APEC member countries ,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to the mid to high end of the value chain.

Key words: bilateral relations; import trade; import products' quality; China's enterprises